

未来100年大眺望——

中国作家院士

十人谈

张锲 主编



世纪之交风云际会 作家院士精彩评说



华文出版社

ZHONG GUO ZUO JIA YUAN SHI SHI REN TAN

未来 100 年大眺望——

中国作家院士

十人谈

张 锲 主编

华文出版社

71184/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 100 年大眺望/张镔主编;张贤亮等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1.5

ISBN 7-5075-1158-8

I. 未… II. ①张…②张… III. 未来学-文集
IV. G3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0959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hwbs.com

电话(010)83086853 (010)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大中印刷厂印刷

大 32 开本 10 印张 21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1—8000 册

定价:18.00 元

发世纪之宏论 抒时代之豪情

(序 言)

20 世纪已经过去,21 世纪刚刚到来。在这世纪之交,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不由豪情满怀,心潮澎湃……

未来 100 年的世界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未来 100 年的社会将是“好人社会”,还是“强人社会”?未来 100 年的男人和女人将如何谈情说爱,如何结婚生子?未来 100 年的科学技术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神通广大的化学“魔师”将显露哪些高招?高能物理在微观与高速领域将出现哪些奇观?

未来 100 年的文学艺术将发生哪些嬗变,是平淡无奇,还是惊世骇俗?未来 100 年的法治建设将有哪些新的举措?贪官污吏还会如此猖狂吗?未来 100 年真的会出现替代司法审判与侦查的电脑法官“天公”和太空警察“天眼”吗?……

所有这些,是世纪之交的话题,也是未来 100 年人们仍将持续关心和议论的热点话题。

本书由作家张贤亮、邓刚、解思忠、李矗、叶延滨、朱向前,院士(教授)陈荣悌、洗鼎昌,教授(作家)王富仁、郑秦十位作者,在“未来 100 年大眺望”的总题目下,从各自熟悉的领域各撰一文,分别就未来 100 年的社会变革、法治建设、国民素质、文化景观、科技发展、文学前景等“热点话题”,各抒己见,大胆评说,发世纪之宏论,抒时代之豪情。

其中,既有作家的神游八极,文采飞扬,也有院士、教授的

旁征博引，缜密论说；既有亦真亦幻的憧憬与向往，也有由近及远的展望与预测；既有横空出世惊世骇俗的大眺望大猜想，也有剥茧抽丝深入浅出的议说和探析；既有深刻的思辨性，深远的预见性，又有生动的可读性，活泼的幽默感。

也许，书中有些猜测并不是那么妥贴，甚至是空谷来风，天马行空，有些议论并不是那么准确，还需进一步商榷和推敲，但是它们无不闪烁着独立思考的光芒，足以启迪心智，开拓思路。也许我们不完全赞同它们的议说和预测，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为作者敏锐的思想和敢于坦陈己见的赤诚与热情而感动，不能不为他们畅所欲言敢发时代之先的勇气与雄辩而喝彩。

诚然，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所限，书中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还请方家和读者不吝批评教正为盼。

张 锲

目 录

- 张贤亮: 未来世纪: “不可说”
——关于 21 世纪的展望 1
- 邓 刚: 全新的惊喜惊讶与惊惧
——21 世纪的男人与文学 21
- 解思忠: 国民何时现代化?
——关于 21 世纪国民素质的思考 59
- 李 晶: 憧憬: 好人社会
——关于 21 世纪的童话 99
- 叶延滨: TV 时代的文化景观
——献给 21 世纪 137
- 郑 秦: 从“权力”到“权利”的时代
——纵观中国法的走向 173
- 陈荣悌: 神奇的“化学大师”
——21 世纪化学前景展望 205

洗鼎昌：微观与高速的奇观	
——21 世纪高能物理学前景展望	245
王富仁：世界格局与中国文化	
——影响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因素	259
朱向前：新的文学生长点的寻找与定位	
——以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学实践为 主要背景	285
后 记	313

未来世纪：“不可说”

——关于 21 世纪的展望

张贤亮



张贤亮小传

张贤亮，江苏盱眙人，1936年12月生于南京，成长并就读于重庆、上海、北京。当代著名作家。现任宁夏文联主席兼宁夏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六、七、八、九届委员。

1954年中学毕业后，在当时以“阶级成份”划线的年代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而未能进入大学，1955年从北京移民到宁夏黄河边的农村务农。1957年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被送劳改劳教长达20余年。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重新执笔。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初吻》，中篇小说《绿化树》、《河的子孙》、《土牢情话》、《无法苏醒》，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长篇政论随笔《小说中国》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有9部小说拍摄成电影电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日、希伯来、西班牙等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

—

21 世纪,即 2001 年 1 月 1 日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人类在 2000 年 12 月 30 日的生存状态。世纪转换后,人们会发现世界仍然是那副既令人欣喜又叫人担忧的模样。1999 年与 2000 年、2000 年与 2001 年……不过是时光的自然流逝,世界不可能恰恰在这段时间出现戏剧性或魔术般的变化,得到救赎或惩罚。

实际上,今天中国人发出的有关 21 世纪的话语,全部落入西方的语境。如果中国一直采用黄帝纪年或农历、佛历,或坚守自己历史特点,从推翻帝制还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纪年,中国人在目前所谓的“世纪转换之交”也许会是另一番心境,能用旁观者的身份来看西方人在“世纪末”的热闹了。连计算机的“千年虫”问题也与中国无关,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可麻烦咱们中国人的? 一个“公元”,并没有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准与西方人等同,也没有在观念形态上与西方人同一,却仅仅在历法上统一了起来,因而中国人此时此刻才生出这么多西方式的兴奋和忧虑。

空间仍然分割着,一日中不同的时区仍然存在,文化传统依旧保持(中国人还顽固地把农历春节当做主要节日,世界伊斯兰教徒也以伊历节日为主),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执政党都不信仰天主和耶稣,时间序号却与信仰天主耶稣的西方人合为一体。仔细想来,这个“公元”不有点悖理、不有点不

“公”吗？

但事已如此。回顾历史和观察现实的每时每处，有心人都会发现数不清的无奈。“尴尬人偏做尴尬事”，说的何止是《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只要是人，不论多伟大，都不免做出许多尴尬事来，至于人类群体则更尴尬万端了。于是，在这个被普遍认同的“世纪末”，先是一个早已死去的法国人诺查丹玛斯搞得人惶惶不安，再有个活着的日本人跑来用科学凑趣，证明 1999 年 8 月的某一天有十字连星的天象出现，到时“恐怖大王”就会君临天空，人类的绝大多数（包括中国人）即将灭绝。大约是为了抵制这种恐怖的预言，给中国人“鼓劲”和“激励”，不久前有报刊宣称在 1995 年于古丝绸之路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遗址中发掘出一件锦囊，上面赫然地绣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隶书汉字，并配有清晰可见的照片。在封建时代，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祥瑞”，上奏皇帝立即能升官晋爵的。可惜明眼人一看便知，即使真有这件锦囊，虽然“中国”这个词早在《诗经》上就出现了，但在汉代仅指帝王所在地长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中国”还是晚到 19 世纪中叶与西方各国开始有了交往后才确定下来的。2000 年前的人就能预知“大汉”以后会称为“中国”并且国旗上有“五星”，真匪夷所思！又有人称：西历 2000 年正是中国的龙年，千年之首逢龙年 3000 年才轮上一次，真像一首歌中唱的“千年等一回”了，这是多么大吉大利呀！未来不说 3000 年，至少有 1000 年将是龙的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又是“龙的传人”，也就是说将来的天下将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下。关于“未来的世界是中国的”，在日本的池田大作和英国的汤因比的学术性对话中有过探讨，以后中国一些学者又不断添油加醋，中国领导人虽然

主张建设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学者们却似乎更希望将来是中国化的或“东方文明”的世界，搞得中国人既晕乎又乐观。尽管中国人言必称祖宗，现在中国人又多了一条：言必称未来。

在这个“世纪末”，还有人从过去 1000 年和 100 年的世态比附今日、推测将来的。前 1000 年，即公元 999 年，在宋朝是咸平二年，在辽朝是统和十七年，在天理则是广明十四年。拿我们习惯的正统的宋朝来说，咸平二年在宋辽处于敌对状态的多事之秋还算平安，因而商业渐渐发达了起来，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可是 100 年前的 1899 年却热闹了。那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政治改革全面受挫，旧势力彻底胜利，即将到来的是八国联军和庚子赔款，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时刻。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前 1000 年和前 100 年与现代比附都不恰当，没有类似之处。时移事迁，真正是“换了人间”了。

所以，我以为在这所谓的“世纪之交”，中国人还是抱着佛家提倡的以“平常心”对待为好，还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东方文明”有没有什么特殊优点且不论，在令人保持良好的心态方面的确比“西方文明”具有更大的稳定作用。《佛经》传说释迦牟尼说法时常会“天花乱坠”，这个成语演变到后来竟成了贬义词，不过我仍认为它属于中性适当。如今有关 21 世纪的种种预测，从科学昌明、经济发达、宇宙变化、生态恶劣、物种消亡、教育普及直到爱情婚姻家庭家庭的演变以至于由于“伟哥”的发明而会重新调整两性关系等等说法(眺望)，我以为都有“天花乱坠”之嫌，对我们怎样妥善处理眼前事务并没有多大帮助。

在西方，在诺查丹玛斯之前几百年，还有个叫查尔斯·索

尔伯理的写了一本题为《末日》的预言书,说公元999年12月31日午夜世界将会毁灭。弄得那天夜里世界疯狂迷乱鬼哭狼嚎,歇斯底里症席卷欧洲,许多人因恐惧而自杀。因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原罪”基础上的,人人天生有罪,都逃不脱上帝的最后审判,诺查丹玛斯等人的预言就由此而来。公元2000年以后,人类安然渡过了诺查丹玛斯预言的劫难,“西方文明”肯定还会制造出类似的预言。东方文明却讲究人的修炼,个人的修炼决定个人的果报,群体的修炼决定群体的果报;“三千大千世界”即宇宙空间是无限的,其存在时间也无限久远,人类怎么来的又将向何处去,这类问题佛都说“不可说”。富有中国民间特色的玄学色彩的预言《推背图》和《烧饼歌》,“推”到最后也没有终极的毁灭性结果。总之,不管是儒是佛是道是术,“东方文明”中从来没有“世界末日”一说。这种观念极为聪明达观,“东方文明”的核心既是“听天由命”,又是“人定胜天”的。抱着这种宇宙观,如果人生态度积极的话,保证会无往而不胜。所以,我们中国人大可不必跟着西方人瞎起哄,还是将眼前的改革作为当务之急进行研究为好。预测得再美妙,做不到或不去做也是白搭,预测得暗淡无光大难临头,但如果能不断自我调整、自我改善,将目前进行的改革大业坚持并深化下去,中国必然真正会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全世界,在多极化的世界中成为最重要的一极。因而我想,与其让人“眺望”未来,不如邀请人提出可行的改革方案。改革,关乎到每个中国人及其后代的生活命运,不止是中央和地方领导集体的事业,有道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人人都从他(她)自己的角度出发“虑”一下,也会集思广益的。

二

对未来,也许我过于乐观。我的乐观来自对人类的信任。我是相信人类自身拥有解决每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能力和潜力的,一直对上述“世界末日”及其他种种危言持怀疑态度。即使在当代,二战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许多学者也曾不断告诫人们大难将至。1960年,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大声疾呼:如果西方国家不单方面裁军,数月之内会爆发核子大战;1965年,“派道克兄弟会”预测,到1975年,地球上大部分人口将死于饥荒;美国颇具影响的《生活》(LIFE)杂志在1970年告诉广大读者,10年以后即1980年,城市居民可能需要戴防毒面具,以防空气污染,到1985年,穿透云层、照耀地球的太阳光将减少一半;更有著名的“罗马俱乐部”从70年代开始就不断对世人发出警告……所有这一切,至少到今天为止,人类的生存环境尽管日益恶化,但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预言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虽然事实证明中国目前已经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但1995年美国学者布朗仍坚持他的论调:“到下一个世纪,世界将不能养活中国人。”当然,我们不能把这种种忧患都看做谬论,更不应当做恶意的诽谤。人类社会需要“盛世危言”。好听的话令人鼓舞,难听的话使人警惕。

所以,我本人并不乐意作种种“眺望”,参与“天花乱坠”的行列。可是既然出了这么一个“眺望”的题目,我又不好推却,我只能说,今天来“眺望21世纪”,实际上包涵许多希望的成分。对未来的“眺望”与其说是理论的思考或是占有大量数据

的科学推论,不如说是主观想象估计的成分更多,至少就一个作家来说是这样。不过也值得一读:因为眺望者的主观中已经含有个人的理性常识,他是从他立足的全部知识出发放眼未来的,所以,“眺望”实际上是作者对目前社会状况的了解与评估;此时此刻、也只有此时此刻才是明天的历史条件,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

同时,我认为,眺望未来世界和理解我们现在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一样,思想,也许比“理论”更为重要。我们现在不缺乏“理论”,我们更需要有悟性的思想。

恰恰在“本世纪末”的 1997 年 12 月我出版了一本书,名曰《小说中国》。所谓“小说”,并非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体裁类的“小说”,而是针对市场上一些书名冠诸“大策划”、“大预测”、“大展望”、“大趋势”等等之“大”反其道而言之的。在那本书里,我仅从个人的体验、经验和在劳改年月里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中国的过去和现状表达了个人的看法,“小说”一番,“虑”了一下。在书中我就一再强调它只是一部个性化的文本,仅仅是一个源于生活的个人视点,我个人认为它的内容有一点“悟性的思想”。如果是关心现实生活的读者照作者即我个人的“市场定位”来读这本书,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在一般社会理论著作中得不到的启发。

书出版后,没有搞什么商业炒作,在短时期内就悄悄地销售了近 10 万册。但倘若将这本书当作社会理论著作来看,这本书当然不完全符合“理论”的要求了。《文汇报》上有一篇题为《小说家的社会理论著作》的署名评论就很典型。文章说:

“新时期文学产生了大量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结果最先跨出文学领域去写社会的倒是小说家。产生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小说家用太多的时间去关心现实生活,而批评家则用太多的时间去关注那不断虚构的世界;小说家用虚构的世界去回应、拥抱或反对现实世界,而批评家则在虚构的世界中游泳、挣扎而难以达到彼岸。何况,我们的文学在那个时候还有着历史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失重与偏颇。从这点上说,我十分敬重张贤亮和梁晓声继续热心关注生活和重新热爱理性的精神。但是,问题往往在于优点和缺点的生死与共,长处与短处的唇齿相依。文体转变了,写作性质转变了,还继续以一副小说家的口吻,继续地放纵小说家的叙述方式,一如既往是灵感和即兴表演,话语上的演讲才华,思想的跳跃和过分急切的总结,还有那些不应该有的随笔性的议论,前后不相连贯的散文段落,重大议论之后的却是小说家对生活的印象。比如,你要议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呼唤精神贵族’、‘给资本主义平反’、‘劳者有其资’等重大问题,都不是随便讲讲身边琐事,个人经历和苦难,甚至出国访问的小插曲所能了事的。是的,面对一个大堆大策略、大趋势、大预测,张贤亮自称为‘小说’,可是从他那蜻蜓点水式的海阔天空,也实实在在称得是一部‘大说’。”

批评者没有恶意,问题在于批评者的误读。首先,将我的书指认成“小说家的社会理论著作”就把那本书挪了位置,从“当代文学”柜搬到了“社会理论”柜,这虽然不像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归于“科普读物”那样荒唐,但也错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不知梁晓声是什么意思,也许他以毛泽东曾用过的书

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命名自己的书是想将他的书挤进“社会理论”队伍,而我仍然坚持申明我写的只是一本文学性政论随笔。尽管批评者说“不应该有的随笔性的议论”,但我不知道谁有权制止我“不应该有”,为何“不应该有”? 17、18 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几乎都用“随笔性议论”写文章,直到现代,如詹姆斯·鲍德温、让-保罗·萨特、乔治·奥威尔的一些书,也常常以散文随笔形式阐述社会、哲学与经济观点。用看惯了“理论”的眼睛读他们的书,可能也会感到那些书里也有“海阔天空”和“蜻蜓点水”的味道。可是,历史证明每一个时代产生的新的思想及某种想法,开始时都只像火花似地闪烁出星星点点的光芒。苛责它们没有强大的理论支撑,没有成套的体系,无异于企图将其扼杀。

我曾在那本书中多次强调,一个小说家,也许比一个社会理论家更能吸收来自现实生活而不止是来自书本的启示。《小说中国》一书,不过是我作为当代中国的一名小说家面对急需改革的现实产生的敏感和激情的直接表述,用随笔性的议论比用理论的推导更便于表达出我的思考,并且也比理论性文章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可读性。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唠叨上面那些话,正是以一个作家的视点奉命写“未来 100 年大眺望”。我觉得这次编者的编辑方法很好,好就好在让职业身份不同的人同写一个大题目,这样,整本书内容也就自然而然分门别类了,免得人误读,又将作家的话语当成理论家的话语。而“眺望”未来,又是一个“理论”会显得苍白无力的领域,于是,每一位作者的“眺望”,当然也就只能代表他或她自己的视角。

现在,请允许我抄录《小说中国》一书的最后一章。《小说